

时间现象学的基本概念

[德] 克劳斯·黑尔德 著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 译丛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时间现象学的基本概念

[德] 克劳斯·黑尔德 著

靳希平 孙周兴 张灯 柯小刚 译 靳希平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现象学的基本概念/(德)黑尔德(Held, K.)著;
靳希平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1

(哲学的转向: 语言与实践译丛)

书名原文: Die Grundbegriffe der Zeitphänomenologie

ISBN 978 - 7 - 5327 - 4693 - 4

I. 时… II. ①黑…②靳… III. 时间-现象学-研究
IV. P19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3595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时间现象学的基本概念

[德] 克劳斯·黑尔德 著

靳希平 孙周兴 张 灯 柯小刚 译

靳希平 校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5 插页 2 字数 90,000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ISBN 978 - 7 - 5327 - 4693 - 4/B · 301

定价: 15.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7602918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 译丛
Turning of Philosophy: Language and Practice

主 编 庞学铨

副 主 编 应 奇

学术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江 怡 孙周兴 倪梁康 钱 捷

徐向东 韩水法 童世骏 翟振明

总 序

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继续存活于一种对其哲学内涵有所了解的解释学之中。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尔·马克思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我们把它称作“实践理性转向”。所谓“实践理性转向”，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哲学界在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元伦理学阶段和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阶段之后，恢复了对于价值的理性基础、规范的根源和辩护，以及伦理学与本体论的关系这些实践理性的传统主题的兴趣。无论是在研究的主题、范式、方法方面，还是在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方面，“实践理性转向”都可以说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这一转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语言学转向”是相对于古代的“存在论转向”和近代的“认

识论转向”而提出来的,它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范式转变。只要我们观察一下“语言学转向”兴起之前的两次哲学转向,就会发现,一种哲学范式的真正确立最终依赖于自身规范基础的阐明和辩护。古代哲学的理念,即善的存在论学说,是其目的论伦理学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目的论的伦理学则是古代存在论的规范内涵;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近代认识论是道德自主性学说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道德自主性则是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规范内涵。按照这样的提问方式,我们很有理由追问,“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是什么?相应地,所谓“实践理性转向”——如果这种“转向”名符其实的话——的哲学前提和基础又是什么?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遭遇了“语言学转向”与“实践理性转向”之间的关系这一贯串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重大问题。

首先,“语言学转向”对 20 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实践哲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提出命题或陈述的三分法,把价值判断放逐到无意义的领域,而元伦理学则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在对价值词汇用法的琐碎研究上,放弃了理性地探讨价值分歧和规范基础的重要使命。50 年代以后的“后实证主义”革命冲破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樊篱,对价值问题的探讨持更为宽容的态度,为实践哲学的复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是实践理性转折的前奏,但其物理主义倾向以及此后继语言哲学而起的心智哲学研究取向,又引发了在规范问题、价值属性和价值判断问题上的新一轮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以及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之争。直到 20 世纪末,“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依然是一个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例如,在分析哲学的匹兹堡新黑格尔学派内部,是像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random)那样继续坚持“语言学转向”,承认拥有信念和意愿仅仅是玩一种运用这些词汇的语言游戏,因而哲学的职责只是阐明我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实践,而不是根据外在于这些实践的规范判断这些实践;还是像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那样,在坚持不具有概念结构的东西无法证明信念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坚持非判断的心理事件能够证明信念的合理性,从而得出“除非知觉现象不同于判断,否则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康德意义上的自由”的结论,这已经成了一场震撼盎格鲁-撒克逊哲学界并且波及德语学圈的大争论。而在新法兰克福学派的语用学的“真理共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和法国后现代主义相结合所产生的新实用主义倡导的“语境论”之间的辩论中,又出现了对于民主的规范含义的不同理解:对于真理共识论者来说,民主是基于普遍的交往理性的包容性共识;对于彻底的语境论者来说,民主只是受文化和地域限制的一种排他性的团结。诸如此类的重大分歧不免使人对“语言学转向”究竟要转向何处心存疑虑。

其次,尽管实践理性是西方哲学的固有传统,但当代的“实践理性转向”和“实践哲学复兴”又有它独特的背景和前提。实际上,从“语言学转向”到“实践理性转向”的演变昭示我们,这两种转向之间不但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具有逻辑上的相关性。一方面,“语言学转向”是绵延整个20世纪,横跨英美与大陆两大传统(新法兰克福学派中有把实用主义独立出来,与分析传统和现象学传统鼎足而三者)的基本范式,就此而言,它不但构成了“实践理性转向”的背景,而且为后一种转向创造了条件,或者说为更好地阐明自身的规范内涵创造了条件,这尤其表现在滥觞于日常语言哲学并经与美国实用主义互释后产生的所谓

“语用学转向”中。另一方面,作为“实践理性转向”之重要一环的道德心理学研究的勃兴则不但在智识氛围上呼应了心智哲学在 20 世纪晚期哲学中日渐上升的地位,而且从智识效能上对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于宣告分析哲学已死,“语言学转向”这一范式也已经走到了尽头;更为重要的是,语言哲学中的(与语言含义相关的)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心智哲学中的(与心智内容相关的)个体主义与反个体主义之争,以及实践哲学中的(与规范辩护相关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争,这三者之间的纠结和紧张将引领人们重新审视分别由分析学派和现象学派在 20 世纪初以反对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之名发起的哲学革命的潜能是否已经消耗殆尽,而这不但关乎自古希腊以来即已奠基的作为理性守护者的哲学事业的命运,而且与人类对于自身以及我们置身其中的共同体的自我理解密不可分。

上海译文出版社历来重视当代西方哲学重要著作之译介,所创设之“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更是在学术界享有良好的声誉,深受读书界的喜爱。“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踵武前贤之事业,尝试以更为主题化同时也更富时代感的方式系统地译介 20 世纪晚期西方哲学的代表性成果。一方面旨在围绕关于遵守规则和私人语言、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争论,集中展示语言分析传统对于价值与规范的理性和形而上学基础的探讨,同时关注当代欧陆哲学中重视把分析传统与现象学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家的著作;另一方面试图较为全面地呈现“实践哲学复兴”中道德哲学(包括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方面的优秀成果,同时关注当代欧陆哲学中对古典哲学的根

本问题和现代性的根本内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性的探讨,还涉及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

我们期望并且相信,根据对于西方哲学发展趋势的上述理解和把握,按照问题性和前沿性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哲学同仁们艰苦、扎实、细致的工作,本译丛必定能够把中国哲学界和出版界的西学译介工程真正推向深入,促进学术界对于 20 世纪西方哲学建设性成果的全面总结,并最终为当代中国的哲学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滋养。

本译丛得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支持。

庞学铨 应奇

2007 年 1 月于杭州

译者前言

这里呈献给读者的是德国著名现象学家黑尔德先生 2004 年国庆期间在北大作系列讲演的讲稿。

黑尔德先生师从胡塞尔的助手、胡塞尔《经验判断》实际撰稿人兰德格雷伯(Landgrebe), 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现象学的研究和现象学运动在德国的推广工作。他最著名的著作是《活生生的当下》(1966 年)、《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与哲学和科学的开端》(1980 年)、《世界现象学》(2002 年)、《在柏拉图处碰头》(2001 年)。他是当代德国具有原创性的现象学家之一。

黑尔德先生生于莱茵河畔, 具有莱茵人谦和、热情的性格。他数十年如一日, 热情参与、鼎力推动和支持现象学在亚洲, 特别是在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中的发展。中国现象学会的成立就得益于他的建议和支持。他是中国从事现象学同仁的老朋友。

黑尔德来北大进行系列讲课的计划始议于 1997 年我在乌珀塔尔(Wuppertal)访问期间, 原定 1998 年 10 月“国庆”间举行, 但是行前不久, 黑尔德先生的女儿病重, 不能离开, 临时派他的得意门生彼得·特拉弗尼(Peter Trawny)代他来北京主持了系列讲座。后来又有两次计划, 均由于意外原因, 未能成行。2004 年 10 月, 几经挫折的计划终于变为现实。

尽管这次讲座是在“国庆”长假期间举行, 来听讲座的学生

和同行仍然把燕园老化学楼二楼的小会议室挤得都要爆了。平时可供 30 人上课的教室，一下子进了 100 多人，还有许多人站在楼道上。外哲所的秘书孟令朋把会议室中的书桌、讲台全部搬到楼道上，大部分人才被塞进去。讲课期间还有一段小插曲：第四次讲座，从下午 2 点开始，题目是希望现象学。讲完之后，同学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直到天黑仍然不能散场。正当我在为黑尔德先生翻译他的答疑时，突然停电，教室里一片漆黑，但是听课的学生和黑尔德先生都不肯离去。在黑暗中，黑尔德继续他的希望现象学的精彩答疑。接近晚上 8 点钟，同学们才依依不舍地同黑尔德先生告别。黑尔德先生十分兴奋。他说，他一生从来没有这种经历。中国年轻人对哲学的浓厚兴趣令他大为感动。

北大的四个讲座(第二到第五讲)是黑尔德先生专门为北大之行而写作的。这次准备出版时，又征得他的同意，将以前发表的两篇与时间相关的文章一并收入。其实译稿早已收齐，但由于本人生性疏懒，拖至今日，才将全部文字仔细校对完毕。柯小刚译出第四讲，张灯译出第五讲，张灯还帮我补译了第一讲，第六讲由我和孙周兴共同译出。赵月瑟老师对中国现象学发展的一贯支持是同仁们有口皆碑的。这本小册子得以同读者见面，也有赵老师的一臂之力，值此机会一并感谢。

柯小刚与张灯的译文，我作了不少改动，时间关系，未能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有舛误，均由编校者负责。

靳希平

2006 年元宵夜

京西小清河畔

目 录

001	译者前言
001	第一讲 作为数字的时间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时间观念
027	第二讲 时间和永恒的古代形而上学
047	第三讲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本己时间
067	第四讲 判断力的长处与弱点
085	第五讲 希望现象学
103	第六讲 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

第一讲

作为数字的时间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时间观念^①

(张灯译)

时间问题毫无争议地属于对 20 世纪思想家触动最深刻的问题之一。在这一难题重新被纳入语言分析哲学的讨论之前,首先是柏格森,然后由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推动了这个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对时间问题的研究进展具有某种二元论的特征:一方面是原初的或本真经验到的时间,在胡塞尔那儿就是“内在时间意识”、在海德格尔那儿就是“去了封闭(entschlossen^②)的此在之绽出的时间性”。另一方面是胡塞尔称之为“客观时间”、海德格尔称之为“流俗的时间观念”派生的、从真实的生活世界中异化出来的时间经验。这二者被明确地区分开来。基本趋势用这一区分将时间的可度量性和可计数性归诸派生的时间体验联系。在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定义,即时间是“运动的数目”中,时间与数字的关联表达得最为明晰。这种时间与数字的联系有别于生活世界中本源的时间性,它应属于断裂的时间经验这个层次上的东西。

只要我们想在古典哲学中找到权威或可供借鉴的范例,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就是首选: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中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定义明证,人们很早就失去了对时间的原初理解^①。而对于胡塞尔来说,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11卷中对时间的分析则是首先深入时间问题内核的文献^②。奥古斯丁所属的柏拉图主义传统似乎向着时间的本源维度敞开着,而亚里士多德的视角则对这一维度保持了封闭状态。

但这一看法无疑不符合下述事实:被归罪于由亚里士多德所作的远离本源的分析所导致的、其实为臆想出来的所谓非本真的时间阐释——把时间理解为数——实际上是所有柏拉图主义的始祖,也是柏拉图本人的时间理解的本质。在柏拉图的晚期对话《蒂迈欧篇》中,已经引入了理解为数字的时间。但这一点似乎并无大碍,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定义和《蒂迈欧篇》对时间的理解之间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这种印象直至今日已广为传布,因为即便在哲学史的撰写与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语文学阐释中,人们迄今还未曾严肃认真地尝试去弄清楚,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是以何种方式、方法将时间与数字联系在一

① 本部分文字的德文原文曾在P·罗斯(P. Rohs)主编的《时间经验与人格性》(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2年)一书中发表,见该书第13—33页。——译者

② Entschlossen 是由动词 entschliessen 变化到形容词,本意为“坚决”、“果断”,同“决断”(entschliessen)有关。但是海德格尔分别从这个词的两个词根 ent(离、去)和 schliessen(关、闭)的本义的合成中去理解这个词,所以,流行的“决断”的译法似有不妥,现在改译为“去了封闭”或“去闭”,本不合中文习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校者

③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文第8版,图宾根,1957年,第420页起。

④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埃德蒙德·胡塞尔关于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的讲课稿》,原版重印,图宾根,1980年,第368页。

起的,以便同亚里士多德关于时间与数字之关系的看法之间搭建一座桥梁。直到最近,格尔诺特·伯梅才取得了这一突破^①。

我将在下文中借鉴伯梅的工作,讨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牵线搭桥的可能性。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的宇宙生成论——其时间理论与之相关——带有明显的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特征,因为此处所展示的世界基本是依据数字而规定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数字性的东西(Zahlhafte)就是时间。首先我要指出,柏拉图《蒂迈欧篇》之时间理解的毕达哥拉斯主义特征究竟在何种意义上隐晦地、未公开承认地保留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然后,我将提纲挈领地展示,这种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特征仍旧主导着奥古斯丁《忏悔录》中对时间的分析。而依照上面引述的人们对奥古斯丁的理解,奥古斯丁的这种分析恰恰背离了古典哲学远离本源的那种将时间理解为数字的阐释。

我所思考的主题就是古典时间观中哲学史的连续性,就实际的系统性而言,我这里涉及的是,针对首先由现象学传统所代表的猜疑提出反驳,这种猜疑认为,时间与数字之关联的确立本身就标识了远离起源或异化于生活世界的时间经验。我之所以反对这一猜疑,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一猜疑在那些使得哲学与其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发生疏远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现今世界中,对这种疏远的确认所产生的影响十分危险。

我并不想按照时间顺序从柏拉图开始,而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定义着手,因为这个定义的基础是接近现象的分析,为我

① 格尔诺特·伯梅(Gernot Böhme):《时间与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和康德的时间理论研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4年。对这篇论文给予的重要启发我表示感激。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间问题的第二手资料,我参考了此论文中所列的参考文献。

们提供了进入实际问题的最佳入口。我在文章开头引用的这个定义并不完全。其完整的形式为：时间是“依早和晚来看的运动的数目”。^①“运动”，希腊文为 *kinesis*，在此意指变化的所有形式。每种变化都是一种“自某物始”“至某物终”而发生的进程，这一点我们在位移运动中看得最清楚。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亚里士多德才在他的分析中把位移这种变化当作主要的分析对象。

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时间应当理解为时间段 (*Zeitspanne*)，也就是说，它是对于“从这儿到那儿的变化” (*Veränderung-von-bis*) 来说的，即在位移的情况下：对于从起点到终点的运动不可或缺的那个“多久” (*Wie lange*)。这个“多久”是可以度量的。它具体地发生在对两个运动的比较中。在某人乘飞机从法兰克福到纽约期间，他手表上的时针在表盘上做了七次均匀圆周运动。因此，这个乘坐飞机的旅客可将这种圆周运动用作度量单位，在自己到达肯尼迪机场时确认：飞机的位移运动持续了这种每次皆相等的圆周运动的七倍之久。

亚里士多德定义中的“数” (*Zahl*) 概念不是指我们用来计数的数，即“1、2、3……”等等，而是被计量出来的数，某物的“数目” (*Anzahl*)，即同类物体的 (如“5 根手指”) 集合^②。运动的时间就是在度量中被拿来作比较的、每次皆相等的运动的数目。

在其完整的时间定义中，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仅仅将时间规定为运动的数，而是补充了：“依早和晚来看的。”这一补充是必需的，因为否则此定义根本无法表达出时间上的时间性。它恐

① 参见亚里士多德：《物理学》，219 b 1/2。

② 同上，219 b 5-8。

怕只能说明：每一运动皆可划分为阶段，这些阶段的数目可通过对运动的比较进行计量。从法兰克福到纽约的旅程的第二阶段，即分针做第二次圆周运动的那个阶段，紧随着第一个阶段。然而这种“跟随”同样存在于序数中。“第二”紧随着“第一”，具有某种逻辑含义，比如在一本法律著作中，该书的第二节以第一节为前提，而这原本与时间的前后相继毫无关系。

只有用“早和晚”才能把时间所特有的前后相继表达出来。但是，这些词仍旧无法保证，我们能从定义中听出这里说的是时间，因为我们也可以在逻辑的“第一”和“第二”的意义上使用它们。证明中的前提就是在逻辑上“早”于结论的东西。倘若我们要明确地表达出，这个“早”和“晚”具有时间上的意义，就只能使用“现在”或诸如“当下的”、“今天”、“在这一瞬间”等与之等值的时间限定词。

亚里士多德定义中的“早和晚”具有如上所述的时间意义，显然是这样得出的：在《物理学》一书中，这个定义是书中前面提到作为简单定义的更为详尽的形式而提出来的。那个简单定义就是：时间是那“为现在所划分的”东西^①。第二个定义随后将这个“现在”进一步规定为“早”和“晚”，即早先的现在和后来的现在。

这样，我们就碰到了新的难题：如果亚里士多德在第一个定义中用“现在”定义时间，在第二个定义中用“现在性的早和晚”定义时间，那么他在定义中就使用了某种已经具备“时间”含义的东西，即“现在”。这个定义难道如某些阐释者所宣称的那样，成为循环定义了吗？倘若定义中的“早和晚”不专门意味着时间

^① 参见亚里士多德：《物理学》，219 a 29。